

融通各形态文化 实现“美美与共”

□曾庆瑞 赵遐秋

能与感悟等包容辩证地融会在起。舍此之外,“云门舞集”很难以神奇的风貌震惊世界。

在大陆,经过52年的发展,到21世纪最初10年,电视剧已经成为举国这个时代文学艺术现象的一个全新的重要标志,也可以说,成了新时代的一种“国剧”。

电视剧集文学、戏剧、电影等各类艺术于一身,构成了广博而深邃的审美时空,以电子技术化的成系统的声像符号为艺术语言,以时、空、声、光为基本造型元素,在摄像机镜头前或在电视荧屏上演剧,用彩色的连续活动的画面激活人以“联想”或者“通感”为主的心理活动来讲故事,融合再现艺术和表现艺术、叙事艺术和抒情艺术,让观众参与审美,获得美感并快乐地享受美。这也是融通多种艺术审美的结果。

北京大学教授朱良志在《曲院风荷——中国艺术论十讲》一书中,用“听香”、“看舞”、“曲径”、“微花”、“枯树”、“空山”、“冷月”、“和风”、“慧剑”、“扁舟”等意象题名,讲中国古代艺术和艺术理论之间的关联。该书的重点不在于对具体的艺术理论进行推演,而是意在打通艺术理论和具体艺术之间的通道,“打通艺术和人生之间的通道”。中国古代“文论”中包含丰富内容,和中国古代的“曲论”、“画论”、“乐论”以至“建筑理论”相互关联,是从中国古代艺术中诞生的古典艺术理论。

融通两岸四地的中华文化美,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提供精神的引导和支撑。

先从一个事情说起。21年前,1988年2月25日,台湾的胡秋原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华杂志》与陈映真先生,从中国台湾地区作家陈映真的小说《唐情的喜剧》的重大意义说到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1984》两部书。胡秋原说到的赫胥黎,是美国小说家、散文家兼博物学家奥尔德斯·赫胥黎。1932年,38岁的赫胥黎发表了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用辛辣的讽刺笔法描述了心目中未来的“美丽新世界”。他担心在“新世界”里,没有人再愿意读书,人们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变得被动和自私,真理被淹没在无聊琐碎的世道之中,文化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我们将毁于自己热爱的东西。31年后的1963年,69岁的赫胥黎告别人间,忧患的初衷不改。陈映真1967年写了《唐情的喜剧》以后,也早于胡秋原的文章在1983年8月发表了《大众消费社会和当前台湾文学诸问题》,在1987年11月又发表了《大众传播和民众传播》,两篇文章都针对台湾社会中出现的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曾经提出过的问题,展开了尖锐的、杰出的和非凡的批判。

赫胥黎身后,世人不会遗忘另一位媒体文化研究者和批评家美国人尼尔·波兹曼。他给世人留下了20多部著作。其中,《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已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中国大陆文化界也对“娱乐至死”的问题有了极大的关注。波兹曼说:“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波兹曼的焦虑和痛苦是:“对于一个因为大笑过度而体力衰竭的文化,我们

能有什么救命良方?”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尽管,中国大陆谈论这一问题的时间,距胡秋原的谈论已有16年的时差,距离陈映真的小说和谈论更是相差了二三十年。但是,海峡两岸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在文化艺术观念上是相通的。

从胡秋原算到我们的学生,整整三代人,三代人都矢志不移地坚守人类文化艺术的精神家园,这其实是历史的必然,因为两岸同胞同为中华民族后代。台湾大学教授陈昭瑛为其《台湾文学与本土化运动》一书写自序时说:“如果硬要切断台湾和中国文化的关系,那分割之处必是血肉模糊的。”在民族的美学心理上,对于什么是中华文化的美,两岸同胞有着天生融通的共性。这也是多年来两岸文化艺术能在许多艺术门类方面有频繁的交流,能够彼此借鉴、吸收以丰富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些年来,正因为有文化艺术各领域和层面上的交往互动取得了积极成果,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才不断增强,影响才不断扩大。

融通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化美,为在跨文化传播中共享全人类的审美结晶作出贡献。

一个民族如果闭关锁国,便失去了发展的生机和活力。只有对世界开放,这个民族才会生机盎然、兴旺发达。文化艺术也是如此。现在的问题是,面对全球跨文化传播日益频繁和越来越规模巨大的更加复杂的世界,我们该怎么办?

前些年,有一种声音是鼓吹“全世界文化成为一种文化”的“文化全球化”理论。两岸也有呼应的言论见诸各种媒体。还有人主张:“当世界媒介成为一种媒介,世界文化成为一种文化的时候”,“民族性不能成为中国拒绝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借口”。这当然是个极大错觉。世界媒介不会成为一种媒介,世界文化当然也不会成为一种文化。不否认,经济全球化及信息革命时代的到来,对各国文化、文学艺术和人文社会科学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重要影响,比如,各国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吸纳,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审视和探讨各国文化的世界视角和尺度变得日益突出和重要,不少文化课题都面临全球性的共同挑战,需要各国志士仁人携手合作解决。但是,“全球化”是充满矛盾的复杂过程。在文化领域,它的正确性是有限的,对它必然会产生的负面作用,我们要高度警惕。事实证明,一些人所说的文化艺术也将实现全球一体化是不可能的。全球化的广泛影响,动摇不了民族文化的根基,不可能消除文化的特殊性和个性。

承认文化的差异性,尊重文明的多样性,并不意味着我们拒绝交流。我们既“走出去”,也让别人“走进来”。这些年,我们在世界各地建设“中国文化中心”,建设“孔子学院”,大量举办各种艺术展览和文艺演出活动。同时也坚持融通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艺术美,许多艺术门类都在此基础上,有了新的质的提高,从而更加趋向于完美、和谐,也更加现代化。所有变化,都使我们在跨文化传播中,为世界人民都能够共享全人类的审美结晶作出了贡献。

如果能融通各种形态的民族文化艺术美,两岸的中华文化艺术美、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艺术美,所谓“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也就指日可待了。

更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简史》对台湾文学思潮的第三个发现,则是台湾文学思潮与西方文学思潮逆向发展的回流。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文艺思潮经历了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阶段,但在台湾,朱双一却反复看到了从“现代”向“本土”,从现代主义向现实主义的逆向发展。他发现,西方文学思潮的发展对应于西方资本主义从产生、发展到趋于烂熟,从蓬勃向上到弊端丛生的现代性展开过程。但在20世纪,台湾与“殖民”如影随形,1945年之前直接受日本殖民统治,五六十年代后又和美、日新殖民主义的荼毒。出于追求幸福生活的天性,被殖民者往往会受殖民者所标榜的“现代”、“文明”所吸引。但很快他们发觉“现代”、“文明”未必能带来真正的幸福,反而可能是有害的,于是台湾文学思潮就反复上演了由“现代”回归“本土”的一幕幕。

《简史》在新资料、新史实的基础上有此对台湾文学思潮源流的三个新发现,难能可贵。朱双一曾发愿,“假如能够将资料收集得较为齐全,各种个案的研究也相对较为深入了,那在一二三十年后,或能尝试独立撰写一部《台湾文学史》为我一生从事台湾文学研究做一个总结,并提供一位大陆学者的个人对台湾文学的整体、系统的看法。”

动态

台湾诗人罗门新著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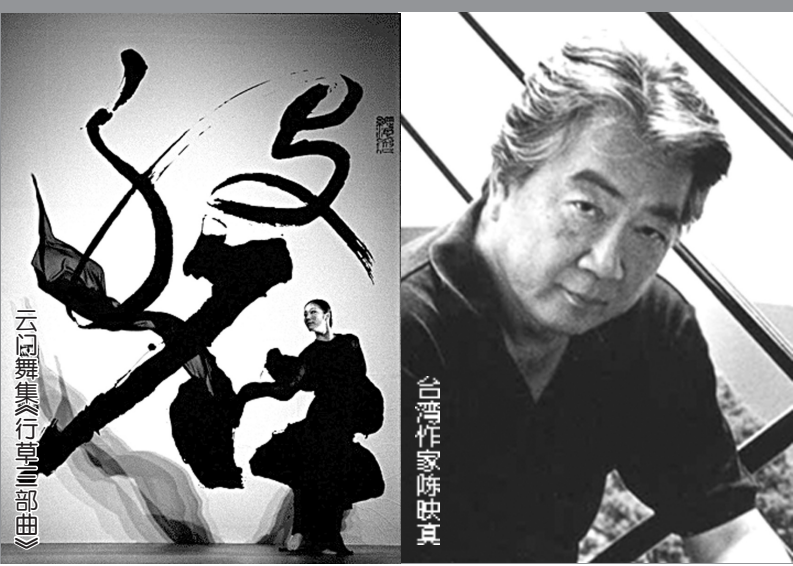
本报讯 12月20日,台湾诗人罗门新著《我的诗国》发布会暨“诗国与第三自然”专题演讲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该活动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办,屠岸、吴思敬、梁小斌、张清华、张燕玲、李少君、杨晓民、萧萧、北塔、李润霞、路文彬、楚天舒、雁西、王明英、洪烛、杨北城、卧夫、盛华厚、南方狼等20余位国内诗人、诗评家、学者,与来自台湾和香港的罗门、蓉子、戴维扬、舒慧等诗人、学者出席了活动。活动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任、诗歌评论家谭五昌主持。

在发布会上,与会诗人与诗评家对罗门《我的诗国》的出版表示祝贺,肯定了《我的诗国》一书中提出的关于“第三自然”和螺旋式地提升诗国高度的诗学理论建构意义;认为诗人应该有自己的诗歌理论,重视诗歌创作和重视诗歌理论二者是相得益彰的。有学者分析了罗门诗歌道路

的两个走向:一是从文本的诗走向人生的诗,二是从狭义的诗走向广义的诗。还有评论家认为,《我的诗国》是罗门诗歌生活和诗歌思维的全记录,书中充满诗人对于人类生命的大思考。无论其理论如何现代、奇崛,罗门始终保有一颗质朴的爱心和作为一个诗人应有的本色。

罗门向与会者详细说明《我的诗国》的创作动机与初衷,并将自己与妻子、台湾女诗人蓉子合著的22册著作赠送给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诗国与第三自然”的专题演讲中,罗门重点阐述了他的“第三自然”的艺术主张,洪烛、戴维扬、李润霞、萧萧、南方狼、盛华厚等与会诗人与学者就罗门的演讲进行了互动性的诗学对话,大家就“第三自然”的涵义、诗人的艺术生命问题、诗人的社会地位与艺术信仰等相关性的话题,进行了坦诚、自由而广泛的沟通与交流。

(刘玲燕)



费孝通先生有一句关于文化自觉的名言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借用后八个字“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恰能说明共同促进中华文化发展繁荣的问题。

融通各种形态的民族文化艺术,为中华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提供审美的参照和借鉴。

“文化”有时间性和空间性属性。其中,空间存在的差别性就是不同的文化存在。文化类型(关系和结构的系统)在同时态中的差别性。所谓有范围的文化,就是一个有空间边界的文化,以文化性质区别于别的时间,而形成为一个“文化体”。不同的文化体都有各自的空间以内的语言、文字、人种、比较稳固的生活方式系统乃至宗教以及山川风物等民族的地域的文化特征。可以说,差异性就是“文化”诸多重要的本质特征之一。属于精神文化的艺术文化,当然也是这样。不仅中华民族的各种文化艺术与世界各个民族的文化艺术有差异,就是中华民族各个不同民族的文化艺术,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不同门类的文化艺术,都是有差异的。我们提倡承认艺术的差异,尊重多样艺术。但这决不意味着,差异会妨碍彼此的融通乃至融汇。文化艺术的共同属性,不仅使融通和融汇有了可能,还使其成为文化艺术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其共同属性就是,各类文化艺术都是人类通过塑造形象、表达情感进行审美的掌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是人类心灵观照世界整体的一种方式。

1973年,从事新闻工作也写小说的26岁的林怀民创立了台湾也是华人世界的第一个现代舞团——“云门舞集”。将近40年来,林怀民和“云门舞集”拥有150多个舞蹈作品,不仅造就了舞蹈在台湾的新境界,也由此影响了台湾的剧场艺术、社区意识,乃至音乐、摄影、戏曲等诸多文化范畴的发展。舞团在欧美亚澳等地200多个舞台上,演出超过1500场,以独特的创意、精湛的舞技,获得各地观众与舞评家的热烈赞赏。“云门”是中国最古老的舞蹈,相传存在于黄帝时代,现在“云门”的舞容舞步都已经失传,只留下美丽的舞名。林怀民以“云门”作为现代舞团的名字,在现代舞蹈艺术里融通了文学、京剧、芭蕾、中外古典舞蹈等艺术,以至于太极、书法、还有道、释中的禅与静坐。比如,《行草三部曲》借助电脑把台北故宫博物院里王羲之的字做成大背景,融入京剧、太极、静坐、武术、书法等传统文化的元素,让年轻舞者的肢体与书法所透露出的能量形成呼应,内外并举,心神交汇,力道、留白、虚实流光溢彩,汇聚舞蹈的肢体语言跟书法的哲学、美学意蕴。“云门舞集”所吸纳的中国传统艺术虽有各自艺术形态质的规定性、差异性,但在艺术审美上都以和谐为核心,将形与神、外与内、力与心、虚与实、小与大、少与多、细与粗、收与放、动与静、快与慢、巧与拙、悲与喜、内敛与外露、铺排与简洁、豪放与婉约、华丽与素朴、再现与表现、体

台湾文学思潮源流的新发现

——评朱双一《台湾文学创作思潮简史》 □陈 辽

一时一地的文学与一时一地的文学思潮关系至为密切。台湾文学的产生和发展更与文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紧密联系。台湾文学研究学者朱双一近作《台湾文学创作思潮简史》,积20年来研究台湾文学思潮的心得,有了新发现。

以往学者对台湾文学思潮研究持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台湾文学思潮的源是中华文化基因,它的发展基本上是直线的、递进的;另一种观点是,台湾文学思潮的源是外来的。古代至近代的台湾文学思潮源自日本,20世纪60年代至今的台湾文学思潮源自西方,它的发展是曲线的又是快速的。朱双一认为,这两种关于台湾文学思潮“源”的观点都趋于简单化,台湾文学思潮的“源”是多元的。首先,台湾文学思潮是社会存在、社会意识在台湾文学领域里的反映。古代和近代台湾官民是由中国官府派出和委任的;民众绝大多数(少部分是台湾的原住民)从福建和广东迁移过去。因此,从官员和民众中间萌生出来的台湾文学不能不受这一社会存在和当时社会意识的制约。古代台湾的有关诗文、郑成功时期的抗清诗文、清初风土杂咏的新诗风都是这样。及至台湾被日本占领,沦为日本的殖民地,社会存在发生了变化,台湾的社会意识也有了很大分化,既有皇民化压力下的“皇民文学”,也有民族观点和阶级观点结合的新文学和左翼文学。1945年,台湾光复,回归中国。1949年,国民党政权退据台湾,又改造和复兴了台湾。台湾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又为之一变。于是乃有后来的“反共”思潮和“反共文学”,自由主义思潮和现代派文学等。其次,统治阶级的思想对于台湾文学思潮的形成和流变,也有重大影响。在古代和近代,台湾的统治阶级是汉族和汉化的满族统治阶级。统治阶级的思想以儒家为本,并与道、佛杂糅。由是,乃有儒家教化的思潮、家庭文学的兴起、乡愁文学的滥觞、华夷之辨的明代东南沿海的抗倭诗文、近代反侵略的“主战”文学等。日据时期,日本的统治思想中,既有殖民、专制、大日本主义等主导思想,也有现代思想。由是,日据时期既有在台日人创作的对殖民侵略的自供、掩饰和美化的文学以及少数文人对日本统治的认同;也有日本文人对“现代”的宣传和部分台湾作家对“新

文学”的欢迎。第三,《简史》又认为,台湾各族文化基因是台湾文学思潮的又一源头。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在上世纪80年代台湾文学坛崛起,布农族小说家拓拔斯·搭吗匹吗(田雅各)、哇利斯·罗干、排湾族诗人莫那能、泰雅族作家瓦历斯·诺干(柳翎)、达悟族散文家波尔尼林、作家夏曼·蓝波安(施努米)、卑南族作家孙大川等等,相继崭露头角并非偶然,因为有少数民族文化基因这个源头起着长远的、隐性的、渗透的作用。第四,无可否认,西方的社会思潮、文学思潮也是台湾文学思潮的源头之一。通过大陆“五四”新文学思潮的介绍而被认知的西方文学思潮,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方现代主义思潮,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后工业文明思潮和现代派文学思潮,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研究”思潮,对台湾文学思潮的形成及其对台湾文学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最后,《简史》认为,台湾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政治风雨也是台湾文学思潮的另一源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它孤悬海外,东西南北都是海洋;它既长期由中国统辖,又曾经被荷兰、日本一度统治;1949年以后,台湾又和大陆隔绝了30年。凡此种种,既造成台湾文学思潮的开放性,又造成台湾文学思潮的传统性;既有过“皇民文学”思潮、“反共文学”思潮、“台独”文学思潮,又有过抗议文学思潮(日据时期)、“鲁迅风潮”(光复时期)、乡土文学思潮(上世纪60年代),从“解冻”到阅读对方的热潮(上世纪80年代以后)。在朱双一看来,只有整合上述台湾文学思潮的五个源头,才能揭示出台湾文学思潮的全部复杂性和丰富性;任何把台湾文学思潮的某单一源头孤立和简单化,以为这是台湾文学思潮的惟一源头,都是片面的、不符合实际的。

与以往研究台湾文学思潮的学者以为台湾文学思潮和台湾文学只是大陆文学思潮的受体和受影响者不同,朱双一又发现,台湾文学思潮和台湾文学还反作用于大陆文学思潮和大陆文学,给大陆文学思潮和大陆文学以影响。譬如,郑成功受中国爱国诗歌的影响很大,1661年率部进军收复台湾后,他曾创作《复台》——即东都诗:“开辟荆榛逐荷夷,十年始克复先基。田横尚有三千客,茹苦间关不忍离。”此诗对当时反清复明的台湾诗人即有影响,特别是在乙未割台、日本人侵略中国时期,在台湾诗人



体恤永恒的困境

□陈 涛

如果有人问我近几年最喜欢的小说作品是哪一部,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是《望断南飞雁》。

作为一个经常阅读文学作品的人,我一直渴望能够遇见彻底击中自己心灵的作品,期待它颠覆我固有的认知经验;期待它撕裂我日益坚硬麻木的神经;期待它促使我去思索追问我的生活与人生。当读完《望断南飞雁》时,我认为自己遇见了这样的作品。

《望断南飞雁》是海外华人作家陈涛女士的作品。讲述了一个在美国学术圈奋斗的中国男人与“陪读”太太之间的故事。男主角公沛宁是一个目标明确,并为之不懈奋斗的知识分子。在打拼事业的过程中,他无暇顾及家庭,家庭的担子大多落在了“陪读”太太南雁的身上。其实在南雁的心底,也有自己的梦想,只是这样的生活严重束缚着她,使她压抑、窒息,梦想不仅没有实现,反而越飞越高,迫使她最终踏上一条抛夫弃子去实现自己梦想的道路。

该作品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杂志2009年12期“海外华人作家专号”,后由新星出版社将它与陈涛的另一个中篇小说《覆水》集结出版。评论家施战军称:“如果说小说要承载多义理解的可能,同时必须实现叙述整体的协调和细部的熨帖,从而实现人物对心灵之路的坚定选择和对生命自由的深在宽解的完美统一,那么,这部中篇小说,无疑是近年罕见的上乘之作。”这个评价是精准的,《望断南飞雁》就是在一段看似充满多指向的旅程中,最终抵达了对心灵与生命拷问的目的。

卡尔维诺曾说,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籍。姑且不论《望断南飞雁》是否为经典作品,但它的确是一个每每读来都能给读者不同感受的作品,寓含着多义理解的可能。

我们可以从对个体的自我肯定、自我价值实现的角度去分析它。沛宁通过自己的勤奋与刻苦,追寻自我的认同;南雁通过离家出走,过那种让心灵自由的生活去实现自我的认同。我们可以从女权主义的角度去分析它。南雁是新时期的“娜拉”,她的出走,是对女性权利的坚忍捍卫,是对男权家庭的强烈宣战。我们也可以从移民生活的角度去理解它,由此来观照华人在美国社会生活中的辛酸苦辣与离合悲欢。以上的每一种解读似乎都有道理,但是又都是偏颇的。

文中的沛宁是深爱南雁的。当沛宁醒来,知道屋外下雪后,“他一个挺身,手直接朝右侧拍去:下雪啦!——南雁喜欢悄然而至的雪夜。”随后沛宁才意识到,原来妻子已经离开自己了。读到这里,真是百感交集,欲哭无泪。这种已经沁入身体、不受大脑支配的夫妻情感记忆,不是爱又是什么呢?沛宁想好好照顾家庭,但是在美国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他根本没有多余的气力去做。他只有不停奔跑,不停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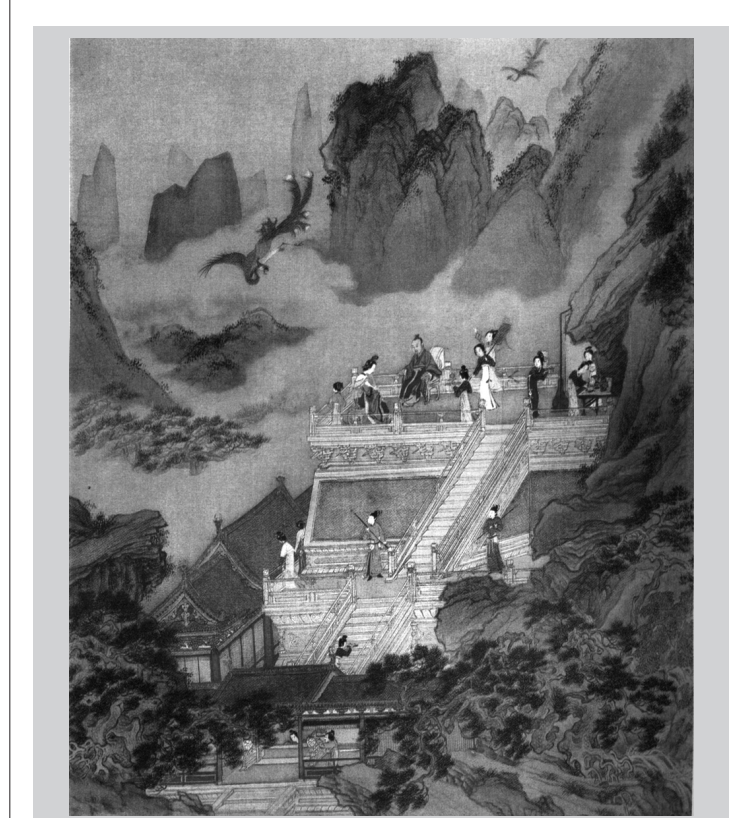
南雁也是爱沛宁的。但她的离去,与爱无关。当丈夫即将获得终身教授资格,当子女可以不用费心照料,长期以来为家庭的付出,那份令自己窒息的隐忍,终于到了可以放心去释放的时刻。在她的内心深处,已经空缺了太多。她必须去寻找一种让心灵彻底自由的生活。也只有如此,她才是自己真正想做的那个人。

沛宁与南雁,原本相亲相爱的一对夫妻,各陷生活泥潭,想爱却无力去爱,只好分离。作者展示给我们的是一份无奈与大悲怆,他们相濡以沫,在外表下却是泾渭分明的精神世界。作者将原本美好的东西毁灭给我们看,让我们在这种深切之痛中,与南雁和沛宁一起去探寻生活的意义、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望断南飞雁》的优秀体现在许多地方。它是一个非常扎实的作品,生活从笔下娓娓道来,叙事技巧宛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作者叙述时的从容与耐心令人惊叹。它是一部充满思索的作品,文中随处可见作者对于生活、家庭、婚姻等的诸种思考。但是这部作品最优秀之处,还是在于作者对精神与生活困境的拷问。

一部真正优秀的作品,并不在于作者写了什么故事,而是这个故事的内核是什么,它有多么的坚硬。所以当剥离故事这层外衣,或者换上另一个故事的外衣时,内核依然是坚硬的,不受任何影响的。

《望断南飞雁》即是如此。它用了小说这样一种形式,通过一对海外夫妻生活故事揭示了我们所常常遇到的人生疑难。也正因为作者对生活与精神困境的拷问,使得故事具有了象征意义。这个故事,可以发生在美国,可以发生在中国,可以发生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故事中的“沛宁”与“南雁”也许正是我们自己,作品所展示出的“沛宁”与“南雁”心中对于生活的无力与无奈,或许就是我们在或者曾经经历的那种对美好“期盼而不可得”的挣扎与煎熬。但它又不是困局般的黑箱,由于作者是贴心地体恤着疑难丛生的人,那个坚硬的内核又好似具有无限生机活力的精神的种子,在不屈不甘中深藏着破土萌发的祈愿。



人物故事图之吹箫引凤 仇英(明)作

华馨 HUA XIN 唐建成首